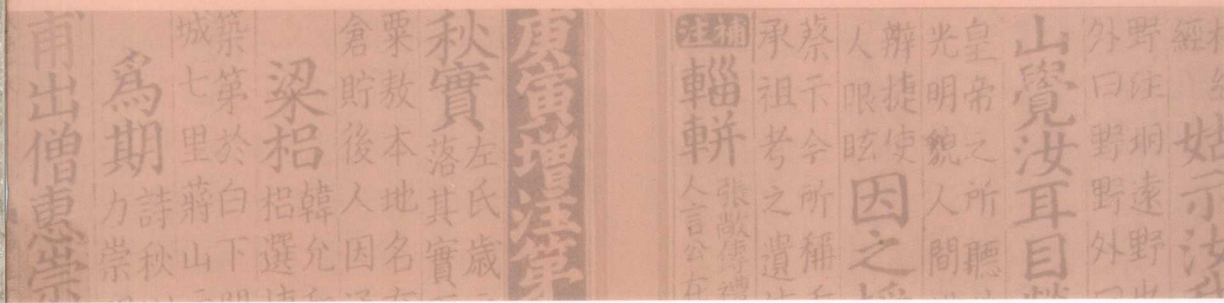




宋集传播考论

巩本栋 著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宋集传播考论

巩本栋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集传播考论 / 巩本栋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4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6577 - 0

I. 宋… II. 巩… III. 别集—考证—中国—
宋代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528 号

书 名 宋集传播考论

著 者 巩本栋

丛 书 名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张 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frac{3}{4}$ 插页 2 字数 33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577 - 0

定 价 45.00 元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总 序

程章灿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古典文献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以一种相对集中而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通过传抄、印刷、编辑、整理、诵读、研究等传播方式,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参预了对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和思想文化内涵的塑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文献传承的过程中,不仅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文献的传承,参预了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特色的塑造,并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心理情感与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而且,作为文献著录和书籍传承的重要支撑的目录学,也一贯致力于整合林林总总的固有文献与已有知识,使之系统化与合理化,与此同时,其自身还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框架。有鉴于此,几年前,当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实施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研究计划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同人们集思广益,提出以“文献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为名设立子课题,并很快通过了专家组的立项论证。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就是这一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显然,在设计这个子课题时,我们主要着眼于其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宏观思路的拓展,力图从大处着眼,以开拓我们的思维。但是,在这项研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针对具体的对象和确定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运用多年的学术积累,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才能真正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不管这些进展是理论方法的创新,还是文献史料的丰富,或是对具体问题研讨的深入。因此,我们决定从专题研究入手,对各项历史文献展开整理、解读和阐释,不避小题,以避免不切实际的蹈空议论。也可以说,我们的宗旨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我们相信,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献进行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构筑坚实的工作基

础,搭建良好的阐释平台,进而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方面基于心理情感以及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文化认同;同时,研究作为文献传承的知识支撑系统的目录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也有助于追踪中国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思想框架形成的过程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我们既注重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的传世文献、儒家正统文献以及域内文献的传承研究,又重视对出土文献、非儒家文献以及域外文献的传承研究。关注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献,当然意味着文献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但更重要的是,从新的文献视野中,也有可能发展出观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新眼光。

具体说来,这套丛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目录学及其历史发展为核心,探讨富有中国特色的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文化框架渐次形成的过程及其特质,最终叩问中华民族文化之特质。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自叙》中早就说过,“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更明确指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徐有富长期致力于目录学研究,其《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择取《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目录学名著,从文献聚散、类别分离、序跋评说等方面入手,辨析古代学术各门类的兴衰分合,从中窥见中国学术思想的起伏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体系中,经学无疑占有首要地位,相关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经学目录在目录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长达三百卷的朱彝尊《经义考》是清初最重要的经学目录著作。它从目录学角度,对清初以前的经学著述之目及其分类、存亡、阙佚等情况详加考述,“源委详明,足称博赡”,可称是一部集大成的经学目录。另一方面,作为朱彝尊“穷一生之力”完成的私家著作,《经义考》所建立的经学目录的新体系,在经学学术史上亦自具承先启后的意义。张宗友《〈经义考〉研究》一书,从文献著录与学术承传的角度对这一部专书条分缕析,论列甚详。

第二,以书院研究为中心,探讨书院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正如《书院与文化传承》一书编者所强调的,“对书院史研究的重视,并不是在单纯保存文化记忆,而是在教育体制发展的背景下,在传统中寻找可供转化的精神资源”。这是众多书院研究者共同的人文关怀,也是编选这本论文集的特别动机之一。从官学与私学的关系来

说,书院显然属于私学。在一定意义上,研究书院与研究私家书目颇为类似。研究私家书目,就是探讨中国传统目录学形成过程中有别并且独立于正统官修目录之外的另一个目录传统;研究私家书目与官修目录如何互动,就是探讨民间学术如何与官方学术相互影响,以及不同知识学术体系如何融合组成传统知识文化体系,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知识文化系统的构建等问题。在这套丛书中,《书院与文化传承》有些与众不同。作为一部论文集,它既荟萃了包括胡适、聂崇岐、邓之诚、瞿宣颖等前辈学者在内的重要论文,又选录了近年学者的研究心得;而它的编者卞孝萱和徐雁平也同样属于两代学者——它从两个方面象征了学术文化的薪火传承。

第三,从那些通常不太为人重视的文献入手,挖掘一些曾经受到忽略甚至被长期埋没的学术问题,探究这些文献中新的学术文化蕴涵。石刻文献、笔记小说文献、域外汉籍文献,都是以往研究中不大为人重视的。虽然从宋代以来,金石学便已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世风和学风的转变,关注石刻文献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对那些传世石刻文献,很多人似乎把它们遗忘了。实际上,不仅二十世纪新出土的石刻值得研究者注意,传世石刻中也仍然有许多意义空间有待开掘,有许多学术问题有待探索。《古刻新诠》是作者近十多年来所撰石学研究论文的结集。书名中所谓“古刻”,既包括传世石刻,也包括新出土的石刻。书名中标明“新诠”,意在强调这两类石刻都有重新诠释的必要和前景,这也正是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书中考释涉及文学、语言、史学、艺术等领域,说明这种诠释正不必划地自限。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实际上也可以改题“古稗新探”。作者潜心研治唐五代笔记小说二十余年,对笔记小说的概念、范围、唐五代笔记传承情况及其文化价值都有独到见解,对与此相关的正史与笔记、事实与虚构、当世记录与后代修饰等重要问题亦有深切理解。本书分上、中、下三编,包括总论、述要与具体考述三个部分,面、线、点相结合,考论相兼,无论是全局描述,还是微观考证,对于唐五代小说、历史及文化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要深入理解文献的意义,不仅需要了解文献自身的形成及其传承过程,也需要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研究积累。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小说研究基本上不登大雅之堂,二十世纪以降,小说研究才“升格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特色与个性之所在”。这一份丰厚的学术遗产应该及时清理,其中的利弊得失亦有待总结。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二十世纪上半期、建国后三十年、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成果作了全面盘点,尤其突出有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名著的文献。小说的产生、存在、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诗文辞赋等文学样式有很大差异,小说研究也相应地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苗著从学术史角度所作的文献清理,显然有助于这两方面的正本清源。

对域外汉籍文献的重视,是本丛书的一个特色。《古刻新诠》中有长文考释《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也十分重视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并以相当可观的篇幅论述宋集撰述流传高丽、朝鲜两朝的情况。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更是致力于发掘日本、韩国所藏唐宋文献,并利用域外访获的资料对中国固有文献进行订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有《帝王略论》、《李元宾文集》、《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等多种。另一方面,作者还从出土文物以及法帖、墨迹等传世文物中,发掘并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唐宋文献。如果说文物是以另一种物质形态出现的文献,那么,域外汉籍则是在另一种文化环境生存的文献。如果说文物指向的是物质文化与典籍文化的复杂联系,那么,汉籍在域外的承传,则往往是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密切关系的见证。

第四,对宋代文献的研究是本丛书的重点之一。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国文献传承史上,宋代是由抄本时代真正进入刻本时代的转折点。无疑,刻本时代的到来对文献传承和文化繁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宋集的刊刻和流传,无论就其外部条件还是就其质量及数量而言,都远胜前代。《宋集传播考论》从宋集的编辑、刊刻、流传以及明清人对宋集的整理等方面,对宋集的传播作了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集是宋代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宋集的传播也就是宋文化的传播。在宋集之中,诗选颇为引人注目。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好讲学,好议论,也好选诗、评诗,加上刚迎来刻本时代,南宋诗歌选本盛极一时。甄选前代或当代的诗歌,甚或加以评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文献传承的行为,而其成果便转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献。这些文献承载了当时人的诗学观念,承载了后人对前代诗歌文化的理解,记录了后人对再后人的影响痕迹,尽管其后来或存、或残、或佚,但通过对这些文献遗存的清理,我们观察南宋诗学之时,就可以占据一个更好的文献传承的视点。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重点考论的八种南宋诗选以及其他二十多种诗选,在这一方面的意义不容小觑。与前两种著作不同,孙立尧《宋代史论研究》则以史论文献的整理与阐述

为中心。“宋代是中国史学的颠峰,而史论正好契合了宋代的文学、史学、经学与理学等诸多学术问题。”史论据史事而发,集中体现当时人对历史的理解与利用;又依经立论,深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论说文体,其文章又呈现出文学化的诸多趋向。夸大一点说,宋代史论是一种跨越经、史、子、集四部的文体,遗憾的是,以往学者对此类文献关注甚少。孙著不仅有对两宋史论发展的线性描述,对史论的文学化与理学化也有颇为深入的剖析,很值得一读。

这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目前都供职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多年以来,他们精诚合作,凝聚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这个集体的成员们坚持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学风,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本丛书就是部分团队成员的集体展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作者队伍中,既有寿逾耄耋而老当益壮的卞孝萱先生,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人,还有年方而立的后起之秀。当然,读者们也不难看出,丛书中有少量成果是在课题开始之前完成的,这说明我们一贯的研究方向与这一课题旨趣不谋而合。整理典籍,阐释国故,发古典之新义,阐旧邦之新命,这是文献传承的核心内涵,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许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目 次

综论篇

论宋人别集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3
一、宋人别集编纂的概况	3
二、宋人别集的类型和编纂体例	7
三、宋人别集的保存、刊刻与流传	14
四、关于宋集宋注	21
论明人整理宋人别集的成绩	31
一、元人对宋集的收藏与传刻	31
二、明人对宋集的搜集与保存	33
三、明人对宋集的刊刻与传播	35
四、明人对宋集的辑录与选编	44
论清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	51
一、清初士人保存文献的意识	51
二、四库馆臣辑宋集的成绩	55
三、清人对宋集宋注的整理与传播	69

域外篇

论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	79
一、宋人的别集与总集	79
二、宋集之朝鲜本与和刻本	83
三、宋集之选本和注本	86
四、诗话及其他域外文献中所见宋代文学史料	95

论朝鲜时代的宋人诗文选本	103
一、对宋诗发展的认识	104
二、对理学诗派的钟情	109
三、宋四六选本的编纂	114
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	
——从宋本到朝鲜活字本	118
一、宋本的编撰、刊刻与流传	119
二、宋庚寅增注本的版本面貌和特征	123
三、宋本“补注”和“庚寅增注”的撰者	126
四、宋本与元本的关系	131
五、元本和朝鲜本中刘评的有关问题	135
六、宋本与朝鲜活字本	137
宋人撰述流传高丽、朝鲜两朝考略	142
一、汉籍流传高丽、朝鲜两朝概说	142
二、经部书考略	145
三、史部书考略	162
四、子部书考略	174
五、集部书考略	196
六、几点思考	223
人名索引	226
书名索引	248
后 记	273

综 论 篇

论宋人别集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一、宋人别集编纂的概况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代的文治可以说是极为突出的。元人撰为《宋史》即称:“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①并非夸张。宋朝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政治现实,在开国伊始就制定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文官政治的策略,政治、社会局面遂趋于安定,加之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经济不断发展,自宋太宗起便组织整理编纂图书典籍等,大力提倡文化建设,政策上又是崇儒而包容释道,于是涵濡养育,传承创新,终有一代文化的全面繁荣。

宋人著述宏富,为前代所未有。这首先突出地表现为作家和作品数量的众多。笔者仅据今人所编《全宋诗》(正编)统计,作家人数已达9220人,若再加上今有文而无诗传世的作家,当近万人。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著述约在5500种以上,清人黄虞稷《〈宋史·艺文志〉补》又补宋人著述近800种,各类著述达到6300余种^②。其中宋人别集约一千多种(一位作家而有并行于世的多种小集,分别计算)。现存的宋人别集,据沈治宏先生所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尚有740多种^③。饶宗颐先生曾撰《词集考》,对183家宋词别集作过考论^④。而据王兆鹏先生统

①脱脱等《宋史》卷三《太祖纪赞》,中华书局,1985。

②此处数字据刘琳、沈治宏先生所编《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巴蜀书社,1995)统计。

③沈治宏《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90。

④其实,现存宋人别集(包括诗文集和词集),在二书所录之外,仍有不少。比如,据严绍璁先生《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所载,宋吴浚《吴允文集》一卷,就有清鲍渌饮手校抄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与朱淑真《断肠集》共为一册。又,后人重辑宋人别集多种,以上统计亦多不包括在内(如周邦彦《清真集》,即有罗忼烈先生辑校笺注本,香港三联书店,1985)。

计,各类宋词别集有 338 家之多,保存到现在的仍有 310 家^①。祝尚书先生则撰有《宋人别集叙录》一书,对宋人词集之外的 435 家、471 种别集作了考述^②。即就现存宋人别集的数量看,已较万曼先生《唐集叙录》所考 113 家唐人别集,多出六倍。宋代作家作品不但总体数量多,而且个人作品较多、别集卷帙较大的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像原有集逾百卷的作家就有 44 人,朱长文《乐圃余稿》现在虽只存 10 卷,然原有集竟多达 300 卷。而现存别集在百卷以上的也有 14 人,其中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多达二百卷,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亦有 196 卷。

在整个时代和社会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当然还有前人立言不朽之说的影响,宋人对自己的文集的编纂一般都比较重视,平日留意对作品的保存,分期编集,尤其到了晚年,对其作品的编集传世更是备加重视。例如王禹偁晚年自编《小畜集》,自谓“常多病,大惧没世而名不称矣,因阅平生所为文,散失废弃之外,类而第之,得三十卷”^③。苏辙晚年亦曾自道其所编《栾城集》的情况说:

予少以文字为乐,涵咏其间,至以忘老。元祐六年,年五十有三,始以空疏备位政府,自是无述作之暇。顾前后所作至多,不忍弃去,乃裒而集之,得五十卷,题曰《栾城集》。九年,得罪出守临汝,自汝徙筠,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恩北归,寓居颍川,至崇宁五年,前后十五年,忧患侵寻,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见,复类而编之,以爲《后集》,凡二十四卷。

又五年,当政和元年,复收拾遗稿,以类相从,谓之《栾城第三集》。(略)方其未死,将复有所为,故随类辄空其后,以俟异日附益云尔。^④

把作品随时收录,分期编定的过程,说得很清楚,可见其对自己作品的珍视。再比如范成大,晚年自觉体弱多病,将不久于人世,遂“日夜手编其诗

①参王兆鹏《词学史科学》,页 162,中华书局,2004。

②此处统计不包括该书中所收录的应归于宋人总集的诸家宫词、《南宋群贤小集》、《永嘉四灵集》、《沈氏三先生文集》、《清江三孔集》、《柴氏四隐集》等。

③王禹偁《小畜集自序》,见《小畜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栾城后集引》、《栾城第三集引》,分别见二集卷首,《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文,数年成集,凡若干卷”^①。惟恐生前不能完成。其他像司马光、范祖禹、邵雍、陈师道、秦观、贺铸、叶梦得等等,都是如此。尤其是程俱,先曾自编文集若干卷,“后遇火,焚弃殆尽。稍复访集,尚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为四十卷。”^②都可看出他们对文集编纂的重视。

宋人对文集的编纂又非常认真、谨慎。对自己作品的收录,往往反复斟酌,精心选汰,以取信于世。欧阳修所谓:“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③,便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宋人的这种心理。比如,黄庭坚“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④。黄庭坚去世后,他的外甥洪炎为他编辑文集,也秉承其意,除《古风》二首之外,所收诗歌的时间断限皆以他自编自序的《退听堂录》为准,此前的作品一律不收。韩元吉自编词集,有序云:“予时所作歌词,间亦为人传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犹不能尽弃焉,目为《焦尾集》,以其焚之余也。”^⑤不但编纂态度十分严肃,而且连词集的名称都与黄庭坚的诗集相同。再如陈傅良,其生前曾有《城南集》流传,然他自己对其早年之作并不满意,“每自悔焉”。所以他身后其门人曹叔远为之编定文集,所收作品也“断自梅潭丁亥(宋孝宗乾道三年)以后,抑先生意云尔。而哀搜众录,参别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绪。”^⑥不但秉承陈氏生前编辑文集的旨意,而且旁搜博采,反复参酌,耗时五年,方才编定,其态度的严谨,去取的精审,不能不令人称道。然而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作者自己编定文集,起初过于谨慎,删汰较多,继之反倒后悔了。像贺铸自编诗集就是一例。其自序诗集云:

铸生于皇祐壬辰,始七龄,蒙先子专授五七言声律,日以章句自课,迄元祐戊辰,中间盖半甲子,凡著之稿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数年一阅故稿,为妄作也,即投诸煇灶,灰灭后已者屡矣。年发过壮,志气日衰落,吟讽虽夙所嗜,亦颇厌调声俚句之烦,计日后所赋益

①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见《诚斋集》卷八十三,《四库全书》本。

②叶梦得《程致道集序》,见《建康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③沈作喆《寓简》卷八,《四库全书》本。

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引黄大临语,《四库全书》本。

⑤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四,《四库全书》本。

⑥曹叔远《止斋文集后序》,见《止斋先生文集》卷末,《四部丛刊》初编本。

寡，而未必工于前，念前日之纍纍为妄弃也，始哀拾其余而缮写之。^①

然不管是去取的苛刻，还是删汰过多的惋惜，都很能说明诗人对编定文集所持的严谨态度。

宋人文集的编纂，若依编纂者身份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编，一是他编。上举数例便多属自编。然作家自编，多非全集，而且许多作家的作品生前并未编集，因此其文集的编纂就不能不更多地依赖于他人。他编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作者的子孙、兄弟、姻亲等为其编集者，亦有官府所修的；既有门生故吏、乡人为其师长、乡先贤编辑文集的情况，也不乏生平友好为其友人编集的情况，还有一些人虽与某些作家非亲非故，却能慕其人品学问，网罗散佚，为其编集传世，亦颇可嘉。

宋代文治最盛，士人亦多重诗礼传家。比如范仲淹与其侄书，就每每以振兴门楣为言，既谓：“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②嘱其“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门户再起，独在吾仁”。又谓“屡曾咨闻，以足下起发衰门，宜爱重，以副先德之心”^③。而编纂先人的遗集，正是宋人重视诗礼传家的表现之一。所以，宋人颇看重对家集的编纂。在他人代编的情况下，子孙为其父祖编刊遗集最为常见。如，魏野《钜鹿东观集》为其子魏闲所编，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为其次子范纯仁所编，邵雍《伊川击壤集》由其子邵伯温补编，强至《祠部集》由其子强浚明编，晁冲之《具茨晁先生诗集》由其子晁公武编，李纲《梁溪先生文集》为其子李秀之所编，陆九渊《象山先生文集》为其子陆持之所编，袁燮的《絜斋集》为其诸子合编，陆游《剑南诗稿》虽多出其手定，然亦由其二子陆子虞、陆子遹编成等等，皆是子编父集。而像赵湘的《南阳集》、米芾的《宝晋山林集拾遗》、赵鼎的《忠正德文集》、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等，又皆为其孙所编成。还有一些作家的集子，竟是由子孙两代共同努力编成的。像岳飞《岳武穆集》就是如此。其孙岳珂序其编纂经过曰：

①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序》，见《庆湖遗老诗集》卷首，《四库全书》本。

②《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跋范文正公家书》引（《四部丛刊》初编本），《全宋文》失收。

③范仲淹《与朱氏书》十五其六、其十二，《全宋文》卷三百八十三，曾枣庄、刘琳主编，巴蜀书社，1990。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劄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为十卷，阙其首尾，以俟附益。^①

子孙两代，长期搜访整理，其编纂不易可知。其他像张洵为其兄张詠编《乖崖先生文集》，刘澥为其兄刘过编《龙洲道人诗集》，吴淑为其岳父徐铉编《徐常侍集》，周开祖为其岳父陈舜俞编《都官集》，林大年为其叔祖林逋编《林和靖先生诗集》，吴说为其外祖王令编《广陵先生文集》等，亦不在少数。

弟子为先生编辑文集的情况在宋代也很多。如穆修《河南穆公集》，是由其门人祖无择编成的，陈师道《后山集》为其门人魏衍所编，王安石、陈渊、刘子翬、杨万里、叶适、真德秀等人的集子，也是由其弟子所编成的。至如门下故吏为其府主编集（像包拯、张方平文集的编纂等）、生前挚交为其友人编集（如欧阳修为苏舜钦、梅尧臣编辑文集、诗集，朱熹为张栻编文集，辛弃疾为周孚编文集等）、朝臣奉敕编纂（如薛昂奉诏编王安石遗文等）、后人仰慕欣羨前人，因编刻其集（如南宋乾道年间王十朋搜集编刻《蔡襄集》等）、地方官员在任表彰前贤（如南宋乾道间当涂令吴芾与戴翬编订李之仪《姑溪集》、嘉定间安州守陈芾、府学陈之强刻《元宪集》）等等，情况各不相同，然也是常见的宋人文集编纂的方式。

二、宋人别集的类型和编纂体例

宋人别集的类型十分丰富。按照一般的别集编撰体例，收录诗赋文章的别集当然最为常见，然此外以某一种文体单独编集并刊行的，像制诰集、奏议集、四六集、词集、尺牍、宫词等，同样很多。这里先不说原来分体编集后来合为全集的情况，即就现存宋人的别集中就有包拯、叶梦得、郑兴裔、蔡幼学、吴潜等人的奏议集，有李廷忠、赵汝谈、危稹、李刘、方大琮等人的四六集，孙觌的《孙尚书内简尺牍》，以及宋白、张公庠、周彦质、王珪、王仲修等人的宫词，陈傅良的《止斋论祖》等。别集一般都以收录作者的全部作品为编纂宗旨，然抄录部分作品的选集，也不在少数，尤其是

^①岳珂《家集序》，见《金陀粹编》卷十。